

新大众文艺与时代的共振

杪穆

文艺与大众的关系，自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以来，一直是中国现当代文艺和文学史上的基本问题，并在历次文艺讨论中得到了广泛而深刻的阐释。进入新时代，中国社会开启了发展的新阶段，“新大众文艺”应运而生。“繁荣互联网条件下的新大众文艺”被写入“十五五”规划，这一顶层设计不仅明确了新大众文艺作为社会主义文艺的新方向，更以互联网、文艺和大众生活互融共生的新生态，擘画了文艺事业的新蓝图。相较传统，新大众文艺在内容与形式、生产机制与生态格局上都呈现出新颖、丰富和复杂的特征。究其根本，这一变革与互联网的普及密不可分，这也是“新大众文艺”被置于“互联网条件下”加以界定的原因。正是在互联网这一“条件”下，媒介、文艺与大众及其相互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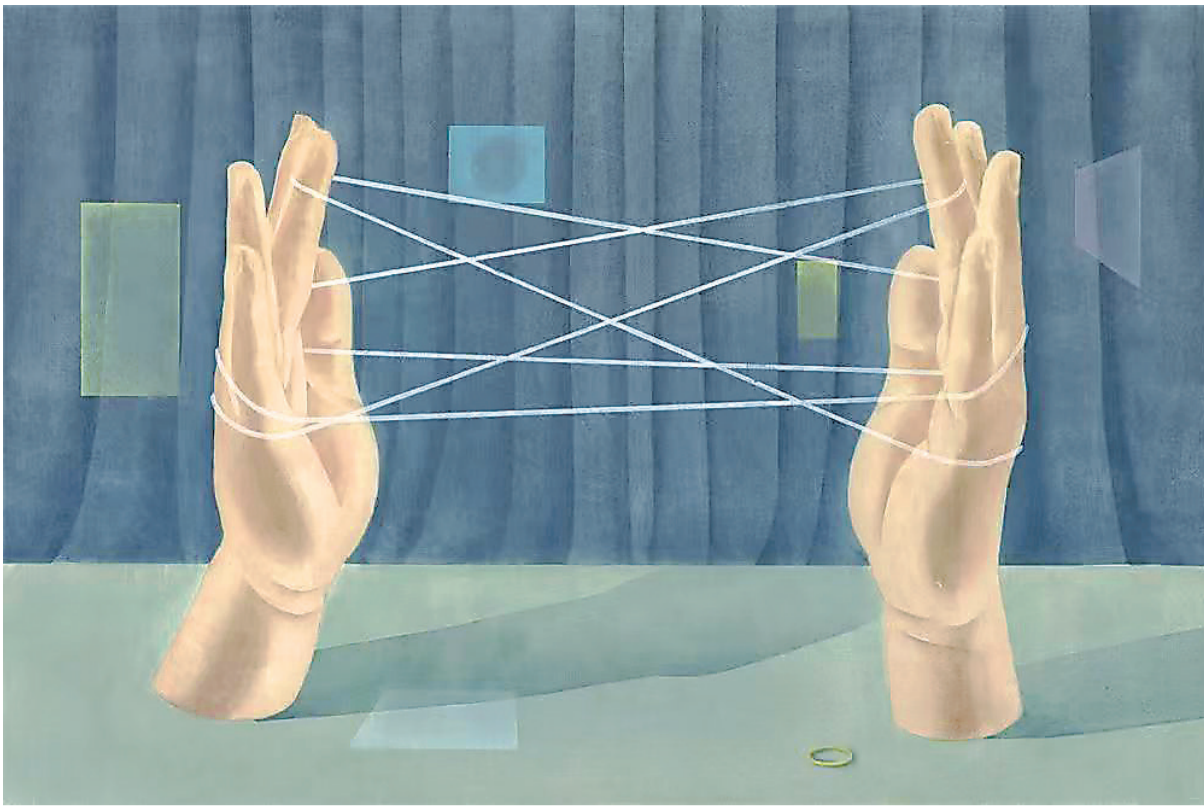
在众多媒介理论中，传播学家麦克卢汉的“媒介即信息”常被用来阐释媒介对社会的重要作用。该理论认为，媒介本身的技术特性对人类感知、思维习惯和社会文化具有深远影响，而不仅仅是其承载的内容。然而，在传统媒介时代，我们更多关注后者，忽视了前者。一代代人阅读《红楼梦》《水浒传》等古典长篇名著，主要是欣赏其故事、人物和思想情感或文体之美，鲜有人关注它们如何被印刷术和商业传播塑造为经典。这种状况源于印刷媒介的特性。文学依靠印刷媒介传播，是从作者到读者的单向传递，我们购买一本书，买的是“内容”而非“印刷品”。在此过程中，媒介的存在被遮蔽。受制于印刷媒介本身的局限，除专业人士外，文学创作、出版乃至阅读，都与大众日常生活关系不大。

互联网的普及催生了一场“媒介革命”。它创造了赛博空间——赋予每个人接收与创造信息的双向能力，例如，我们随手在微信朋友圈转发一条短视频并附上评论，这一行为既是娱乐式的交流，也是日常休闲的组成部分。在赛博空间中，互联网对文艺的直接影响体现在两方面：一是文艺欣赏与消费可随时在线实现；二是普通人成为文艺的创造者与生产者，手机中不断更新的短视频、微博、小红书、B站等内网，大多由大众创作并发布。互联网已演变为人的生存环境，以网络文艺为主体的大众文艺参与建构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，每个人都能拥有独属于自己、定制化的文艺生活方式。我们有了发声的平台，也不断被大数据按照个人喜好推送内容。社会真正进入“日常生活审美化、人人都是艺术家”的新阶段。

随着艺术与生活边界的消解，审美全面渗透进大众日常生活，新的文艺伦理正在形成。其一，大众成为文艺消费、欣赏和生产全过程的主体，文艺领域的“门槛”降低，专业艺术家须坚持“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”，而人民自己也成为文艺创作的中心。其二，大众力量的崛起导致文艺评价标准发生漂移，作品中的“艺术性”“文学性”被稀释，“雅”与“俗”的界限变得模糊，流量成为评价文艺作品与活动的重要指标。例如我们已无法再用传统爱情片的标准去评价像《盛夏芬德拉》《穿越到80年代当后妈》这样流量巨大的微短剧。其三，文艺进入“大众共创”时代，作者和读者的身份界限消失，传统媒介中单向的创作与接受关系被全面重塑。我们在转发微博时加入评论、评论再被转发，既为接受者也为创作者。其四，数据库消费、同人创作、AI写作、跨媒介改编等成为文艺生产中的常态，文艺原创的重要性相对下降，原有版权保护体系面临“二创”“融梗”等现象带来的新挑战。

总体而言，互联网的介入使大众在文艺生产领域成为主角，文艺生产力得到前所未有的解放和发展，进而引发文艺生产关系的根本性变化，新大众文艺正是这一变化的集中表现。可以说，“新大众”不仅是新大众文艺产生的基础，二者更形成了同构关系。追溯“新大众”的形成，我们深刻地感受到新媒介塑造个体和影响社会的强大力量。在互联网机制架构下，身在赛博空间的每个人都在向外界敞开自己，个体成为世界的一部分。只要上网，就无法“独善其身”，现代科技作用于人的能力充分显现，“新大众”群体由此生成。基于情感表达的文艺消费和创作，始终贯穿着普通人对个人生活和社会的想象与期待，进而催生了“想象共同体”的诞生。例如网络科幻小说《我们生活在南京》既呈现了人们对未来科技的渴望，也表达着人与人之间关爱、互助、救赎等美好关系的憧憬。在“新大众”的形成过程中，互联网无疑发挥了重要的组织作用。而反思“新大众”的构成，他们作为国家建设和社会主义的主体性力量，绝大部分接受过系统教育，具有独立思考 and 审美能力——毋庸置疑，拥有大量较高素质的潜在使用群体，也是互联网在中国迅速普及和广泛应用的关键前提。

现代文艺是肩负着启蒙和救亡的使命登上中国历史舞台的。瞿秋白1931年在《大众文艺的问题》一文中提出，大众文艺“要用劳动群众自己的言语”创作，以实现文艺大众化。受到时代条件限制，这一目标在当时难以实现，而得益于中国社会进步与互联网媒介创造的“新条件”，瞿秋白所设想的“文艺大众化”的目标，正在新大众文艺的兴起中逐步成为现实。（作者系中国作协网络文学委员会委员，河北省网络作协副主席）



对话(木刻水印)

龙珩作

在行走中采撷的珠贝

刘益善

王建生要出版一本游记散文集《一唱越千年》，把书稿给我，请我写序，我觉得是有一些话可说的。

阅读要写序的文稿，有多种读法，最难受的一种是硬着头皮读。我打开，不慌不忙地就毫无障碍地读下去了，一点也不头皮发麻。将作品称作游记，作者是要有自信的。如今游记或说旅游散文写的人太多，报刊和读者并不看好，写得好的真不多。这类散文与采风散文联系紧密，不能说没有好的，有人也能写出经典之作。但大多同质化，流于不痛不痒的介绍性材料或旅游说明书。所以我说写游记、采风散文是危险的，没有眼光、没有深厚的人文素养和独特的发现，就很容易流于形式。

通读王建生的游记散文，不能说篇篇都好，但他的游记散文能让你读下去，读完后有收获。这些散文不是泛泛采风后写下的文字，而是他在或自驾、或舟车、或步行的行走中，心灵的震动、眼睛的发现，以及透过历史烟尘打捞史料而获得的人生体验。这些感动过他的体验用文字表述出来，必然也就感动了读者。

说王建生的散文是游走中所得，是我把他的文稿进行了简单的统计。《川西行日记》自驾走了9天，《敦煌四日行杂记》走了4天，《文学中欧行》走了10天，《走进大凉山》走了9天，其他如新疆独库与伊犁、四川草堂、江西滕王阁、内蒙古呼和浩特、云南泸沽湖，行走也是三天五天或更长，看不出他的哪篇作品是没有到过现场而写出来的。

王建生游记散文中，能给读者带来的启发、感悟、思想收获很多，我们在这里挑选三点说说。

到广东潮州旅游，文化历史风景很多，都可以写，但切莫泛泛去写，否则就成了旅游说明书。王建生写潮州，抓住了韩愈。他抽丝剥茧，写出了韩愈为了国家和人民，铮铮铁骨、耿耿丹心。韩愈上奏皇帝《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》等奏章，惹得皇帝大怒，一次次遭贬，“一封朝奏九重天，夕贬潮州路八千”。韩愈在文学上的成就，在治理国家方面的能力只是略写。提到潮州，人们记住了韩愈的铁骨，对他被颂为“泰山北斗”“万世文宗”反倒放在其次。（《八月居潮万古名》）

写岳阳楼的文章和作者不可计数，把岳阳楼写出新意和深度，是对作家的一种挑战。王建生写岳阳楼，抓住了范仲淹。一篇《岳阳楼记》奠定了其“天下第一记”不可动摇的地位，成就了岳阳楼这江南名楼的声望。这篇名文是范仲淹写的，只是他没有到现场，仅仅凭着朋友滕子京画给他的一幅图写成的。《岳阳楼记》的精神内涵为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，写出这种境界的人，没有这等胸襟是不可能做到的。范仲淹苦寒出身，中进士后从九品官干起，干得特别卖劲。怀着为国为民的思想，他当官到一定位置后，多次进谏，得罪了皇帝和权贵。范仲淹是“宁鸣而死，不默而生”，被称作“大宋第一驽”。庆历六年九月，贬在河南邓州任知州的范仲淹，接到好友滕子京的抱负之约，一气呵成《岳阳楼记》，把自己的追求和抱负写进文中，寄到江南的岳阳楼。（《天下情怀岳阳楼》）

王建生行走凉山九天，洋洋洒洒写下了九篇文章，记录了他第一次进凉山、第一次走进彝族居住地的收获，颇多有见解、启人深思的文字。但给我最大触动的是在“彝海结盟遗址”一篇，他详细而生动地写出了1935年红军长征时，在中国革命最危急之际，红军先遣部队司令刘伯承与彝族头领小叶丹歃血为盟，结成兄弟。因为有了汉彝结盟，红军才借道通过彝族地区，不放过一枪，七天七夜走出险境。那是个关键的时刻，蒋介石督阵的国民党围剿部队紧追不舍，红军如果不能快速通过彝区，渡过天渡河，就会重演石达开的悲剧。彝海结盟，是关乎中国革命前途的结盟。王建生在写这一段时，详细而真实，读者读得惊心动魄。（《走进大凉山》）

我不再多作引述，只是通过上面的三篇文章，来说明王建生这本书的一个写作特色。诗歌创作中有诗眼之说，散文创作中也有文眼之论。文眼是一篇文章中最亮眼、最揭示文章内涵的地方。一个作家，在一堆素材中挑选最能表现文章主旨的部分，写出来，打动读者，他的目的就完成了。

王建生的游记散文集，是在他行走的过程中，在所见所闻大量的人、物、民俗、历史和风景中，经过挑选、淘洗、提炼、披沙沥金，刨去表面的浮土和枝叶，挖掘到中心，撷取事物和材料中的核。这核是珠贝，是文眼，是作者要表达的文心与意蕴。

王建生的游记散文，是他行万里路，看千种景，访百种人，在行走中采撷的一颗颗闪亮的珠贝。

（作者系诗人、作家，曾任《长江文艺》杂志社社长、主编）

《皮影娃娃》：少年的审美独具滋味

张年军

一位作家说过，凡是描写人物命运的故事，都能打动读者心灵的琴弦。命运，其实就是你所遭受的挫折。我们这里谈论的是个人的命运，却可以折射出当代社会的发展变化，这也就是少年命运“最大化”了。基于这一具有少年思维的结论，我们来看李伟的儿童小说《皮影娃娃》，作家所写的似乎是小东西、小制作，其实不然，儿童文学作品的优势就在于见微知著。本书讲述的皮影戏不仅仅是一个载体那么简单——我们在看戏，看皮影娃娃，我们看戏中的皮影娃娃，也看戏外的皮影娃娃。戏中戏和戏外戏相互勾连、呼应，共同构筑成生命的离合悲欢、人生的起伏跌宕。如此，便形成一种自洽？也构成了文学色彩含蓄隽永的美学架构。

这部小说讲述了主人公李紫舒在皮影戏日渐没落的过程中，从惊喜到惊艳，再到努力奋斗的故事。李紫舒出身于皮影世家，因基因的传承而嬗变为文化的传承，文化的传承又嬗变为一个少年在成长中的情感凝望。在凝望的空间里，有一个意象推动着情节发展，这便是“一箱皮影道具”，它们既是皮影戏中的道具，也成为少年李紫舒成长的线索。少年偶然中发现它们时，一种跨越时间与空间的情感便自然而然地形成了。此刻，具象的是道具箱，抽象的是时光的伫望与回味。无论是具象还是抽象，故事中的少年在已知和未知的前提下产生了心理落差，小说作者正是利用这种落差来展开情节，又借助少年执着的美好及对皮影戏的情感追索，来塑造人物形象。

小说中李紫舒和爷爷之间的矛盾，并非简单的代际沟壑，而是对艺术执着的爱恨的双向悖反。两代人的心河之上，架起的不是桥梁，而是犹如碰碰车般相互撞击的小船。这种撞击表现出亲缘矛盾的无序发展，矛盾冲突的设置也因此显得纵横捭阖。当皮影戏在爷孙俩的矛盾冲突中被数次点燃时，流淌在冲突底层的则是人物的悲欢聚散，于是形成双层结构。这对读者的深度阅读大有裨益。我想说的是，如果一部作品只专注于讲故事，那么读者获得艺术积淀的期待可能难以实现；反之，如果作品表层讲故事，深层空间却汨汨流淌着人物内心的潜意识，刻画着人物个性特征的多侧面，那么作品就成功了。很显然，《皮影娃娃》属于后者。

本书中，人物和道具的穿插安排十分重要，几乎决定了故事情节的成败。奶奶、德顺爷爷、刘颀子等等，均以伏脉千里、草蛇灰线的谋略呈现，他们一旦亮相，戏剧冲突即刻爆发；他们退出舞台，硝烟旋即归隐，从而构成极具层次感感和画面感的戏剧张力——收放自如，张弛相济，令人咀嚼回味，沉醉其中。小说中，人物的情感犹豫与细节徘徊因不断的闪回而显得意蕴深邃，这些情感与细节，有的来自少年李紫舒，有的则是爷爷生命中的历史积淀。它们展现了人物命运如何在时空的潮水中升降跌宕，讲述人物的喜乐与悲欢。它们所有的细节都依附于我们关注的情感，在历史的缝隙中考验着我们的文字体验感和戏剧体经验感。

读完小说掩卷沉思，阅读者已不再是有距离的旁观者，而是具有独特思考力和感受力的文学侦探或文学编剧。我们深切地感受到：李紫舒的成长之路一定镌刻着爷爷的生命轨迹，而爷爷的生命轨迹又勾勒着历史文化化的足印。这正是文学作品带给我们的情感魔力——它润物无声，悄无声息地潜入血脉，它带来的审美体验伴随着我们一步步成长。

《皮影娃娃》表层讲述好玩的故事，深层却关涉人物的喜怒哀乐及其跌宕的命运。这种特殊的双层结构，应该是少年儿童喜闻乐见的。有一天，有个孩子对我说：他们并不是为了如何规范地成长才去领取教益，而是为了好玩进入故事空间，当他们出来时，发现自己长大了，内心世界也拥有了厚重的积淀。他问，这正是儿童成长的小秘密吗？彼时四面八方均有回音。想必，你也制造了回音，你一定希望早些进入故事空间，和李紫舒握手吧。哈，我都猜到了。

（作者系儿童文学作家）

江花

周刊

8

长江日报

2026年3月25日 星期三

主编：周璐 美编：职文胜

版式：洪菊华 责校：郑德衡

“黑白双咏”的人生境界

罗建华

参观汉阳“知音墨缘”书法展，见到一联条幅出自于谦《咏煤炭》：“但愿苍生俱饱暖，不辞辛苦出山林。”脑海一下翻腾起来，跳出“粉骨碎身浑不怕，要留清白在人间”——它也出自于谦《石灰吟》，如此一黑一白可谓绝配，在心中轰然作响。

读到《石灰吟》时，我还是中学生。当年帮学校图书馆清理旧书，翻出吴晗主编的“中国历史小丛书”，读到一册《于谦》，才知明朝有这么一位民族英雄，手抄本上便多了一首《石灰吟》，它悄悄成为15岁少年的座右铭。

于谦的社会传播度，到今天也不算高，而我能少年时代景仰他，至今引以为欣慰和骄傲。就像矢志不移两写《国榷》的谈迁，就像百姓挽留三不离任的况钟，社会传播度都不高，却皆是深植我心田的人杰。谈迁的“励志故事”，况钟的“离任诗”，都还在当年的手抄本上，总在关键时刻为我注入能量。

时隔60多年，《石灰吟》与《咏煤炭》偶然“重逢”，我又责怪自己孤陋寡闻，错过了早早感受“黑白双咏”的机缘。

《石灰吟》全诗四句：“千锤万凿出深山，烈火焚烧若等闲。粉骨碎身浑不怕，要留清白在人间。”《咏煤炭》全诗八句：“凿开混沌得乌金，藏蓄阳和意最深。爝火燃回春浩浩，洪炉照破夜沉沉。鼎彝元赖生成力，铁石犹存死后心。但愿苍生俱饱暖，不辞辛苦出山林。”二者放在一起品读，一脉相承肝胆相照，胸襟博大高风亮节，怎不叫人荡气回肠？

于谦为明代著名政治家，并非以诗名传世，但有此“黑白双咏”，足以光耀诗坛庙堂，更能活在草根民间。据史料记载，他出生于600多年前的钱塘风雅之地，以进士而任御史，又外放江西、河南、山西等地主政，他心系社稷民生，为官廉洁正直，平反冤狱、救灾赈荒，深受百姓爱戴。“土木之变”英宗被俘后，他受命于危难之际，不惧外族大军压境，力排南迁之议，以兵部尚书之职统兵捍卫京城，迫敌议和，赢得安宁。哪知太上皇得归，反以“谋逆”之罪将其冤杀，一出悲剧实在可叹！

历史断然不会冤屈赤胆忠心，于谦最终获得平反昭雪，其忧国爱民的一生，早在《石灰吟》《咏煤炭》中留下精神写照。《石灰吟》作于17岁弱冠之前，《咏煤炭》赋于为官出道之初，少年壮志，仕途胸襟，寄托于两种藏之深山的俗物——石灰和煤炭。此二者虽不出自同穴，却是一样品性非凡，历经“千锤万凿”“烈火焚烧”，于“夜沉沉”之中释放“春浩浩”，展现“不辞辛苦”“粉骨碎身”的大义凛然。

于谦托物言志，赋予石灰、煤炭以高贵品质。一个为人生留下清白，一个为苍生奉献饱暖，物之质地同人之美德天然合一。深邃的意境，蕴含在石灰、煤炭之中，并不逊于大多诗人偏好的山川日月或松梅竹兰，不只是洁身自好，更回响勇于担当、甘于牺牲的浩然正气，其人与诗，两垂不朽。

感谢先贤。青少年时期之所以称为黄金岁月，那是因为像刚刚拔节的庄稼，拼命张开枝叶，接受种种精神滋养。手抄本中懵懵懂懂收纳了诸葛亮《出师表》、范仲淹《岳阳楼记》、文天祥《正气歌》……不知有多少输入了生命的底色。如今幸遇“黑白双咏”，石灰和煤炭，又哪里只是大地深处的矿物质？